

广东革命政府的军事教育整合^{*}

——黄埔建军的线索之一

李 在 全

摘 要:在1924年筹建黄埔军校前后,广东革命政府所辖的各派军队也基本建立各自的军校。各军自成系统,各校各自为政。随着广东军政逐渐统一,军事教育开启整合进程,作为军事教育龙头的黄埔军校逐渐合并其他军校。1924年10、11月,吴铁城所属广东警卫军讲武堂、程潜所部陆军讲武学校并入黄埔军校。1925年6月平定杨刘滇桂军叛乱中,滇桂军所属的滇军干部学校、桂军军官学校也整合进入黄埔军校。1925年底国民党中央决议统一军事教育方案,决定“打破地方主义”,各军原有学校一律裁撤,归并黄埔军校统筹办理,军校名称由“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改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军事教育整合是广东军政统一的重要组成部分,频繁的军事行动和军政形势变动以及高层与底层的革命力量,均是军事教育整合的助推力量。黄埔军校之所以迅速发展,得益于广东革命政府的军事教育整合,这是理解黄埔建军的重要线索之一。

关键词: 黄埔军校; 广东革命政府; 军事教育; 国共合作; 粤军; 客军

DOI: 10. 13471/j. cnki. jsysusse. 2024. 04. 008

引 言

言及广东革命政府的军事教育机构^①,人们自然而然想到黄埔军校(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无疑,这由于黄埔军校确实是广东革命政府最重要的军事教育机构,其在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地位超群。实际上,与黄埔军校几乎同时,广东革命政府辖区内还存在多所军校,其中,规模较大的有:陆军讲武学校、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建国滇军干部学校、建国桂军军官学校、建国湘军讲武学校、建国粤军讲武堂等,这些军校如今鲜为人知,似乎已经湮没在滚滚的历史洪流之中。事实上,这些军校在广东革命政府扩展军事力量过程中,也起到重要作用,在广东革命政府军政统一过程中,它们逐渐被整合纳入黄埔军校,成为国民革命军的组成部分。换言之,考察广东革命政府如何整合这些军事教育机构,是理解

^{*} 收稿日期:2024—02—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委托项目“新民主主义革命史”(LSYZD21012)

作者简介:李在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研究中心(北京100101)。

① 从1917年开始,孙中山先后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与北京政府对峙。1923年2月孙中山第三次开府广州,组建大元帅府(大本营),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6月国民党中央决议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7月广州国民政府宣告成立。本文论述的主要时段是1924年至1926年,为方便起见,统称为广东革命政府。

1920年代广东黄埔建军的重要线索之一。可惜,在学界关于黄埔军校的诸多研究论著中^①,这条线索似尚未引起学者们之重视,有待深入探究。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非常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创办起来的,主要目的是建立国民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力量,组建一支有主义的军队。当时,作为革命策源地的广东,除了本土的“粤军”外,还存在很多“客军”,如桂军、滇军、湘军、川军,甚至北方的豫军、陕军等。这是因为从1917年护法运动开始,孙中山在广州开府设政,此后很长时间内,一国两府,南北对峙,很多外省“客军”驻扎广东。这些“客军”随着南方政府军政格局演变而分化组合,称谓亦不断变化。1924年9月,北方爆发第二次直奉战争,孙中山率军进驻粤北韶关,准备北伐。孙中山下令,凡参加北伐的军队一律改称建国军。10月广东革命政府所属各建国军编成,计有谭延闿的建国湘军,杨希闵的建国滇军,许崇智的建国粤军,刘震寰的建国桂军,樊钟秀的建国豫军,何成浚的建国鄂军,李明扬、董福开的建国赣军等。

名义上,这些建国军由孙中山和广东革命政府统帅,实际上,很多军队往往盘踞各地,设卡收税,自成系统,不听从孙中山和广东革命政府号令。有的军队专横跋扈,甚至演变成武装叛乱,1925年6月广州就发生杨希闵滇军、刘震寰桂军的叛乱,旋即被广东革命政府平定。这些军队为了发展自身力量,往往也设立军校,培养自己的军队人才,相继建立了随营军官学校或讲武学校,其中,规模较大的就是前述提及的建国滇军干部学校、建国桂军军官学校、建国湘军讲武学校、建国粤军讲武堂等。

据黄埔建军当事人回忆,筹建黄埔军校之时,为了集中人力物力,“孙中山曾有过集中各军所办讲武堂合办黄埔军校的想法”,但是,当时广东为各派军队盘踞的事实情况,使孙中山这个愿望无法实现^②。在苏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决定独立创办一所革命军校。但军校的校址问题,当时争论颇多,因为驻在广东的各派军事力量基本都有军事干部学校,例如西江讲武堂(粤军)、滇军干部学校、湘军讲武堂、大本营军政部讲武学校等,当时有人就主张在上述机构中选择一个加以扩充,不必重新成立。当然,提出这种主张的人并不是打算建立革命军,而是试图扩充自己势力。最后,孙中山决定把校址选在黄埔岛,利用海军学校旧有房屋,加以修理,作为校舍,正好足够三四百人规模的学校应用;选址黄埔的另一原因在于求安全,“因为驻军不可靠,海军可靠,海军是孙大元帅认为最忠诚于革命的一个力量。军校设在黄埔岛,周围有海军驻泊,坏分子不易施展其破坏伎俩”^③。

值得注意的是,1924年初筹建黄埔军校之时,军校亦有联络、联合各派军队的意思。这明显地表现在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当时除了按省份招生外,还特别规定:在广东的各军(主要是客军)招生,“湘、粤、滇、豫、桂五军各十五名;共七十五名”^④。招生工作结束后,4、5月学生陆续入学开课。黄埔军校第

① 关于黄埔军校相关文献与研究论著,数量丰硕,大体有以下几方面:1. 相关史料整理,如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陈以沛等编:《黄埔军校史料(续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刘洪辉主编:《黄埔军校史料汇编》,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2年;陈宇编著:《黄埔军校年谱长编》,北京:华文出版社,2014年。2. 整体性的研究,如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辑:《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1936年(改名《黄埔军校史稿》,档案出版社于1989年影印出版,主要在中国大陆发行);陈宇:《中国黄埔军校》,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3. 黄埔军校某些领域的研究,如曾庆榴:《共产党人与黄埔军校》,广州:广州出版社,2013年;邢照华:《黄埔军校生活史(1924—1927)》,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李翔:《革命的播种者:黄埔军校的政工群体(1924—1925)》,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4. 黄埔军校人物研究,如孙中山、蒋介石、廖仲恺、周恩来、邓演达等以及军校学员研究。值得提及的是,广东历史学者主持的《黄埔军校研究》,第1辑在2006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3、4辑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在2007年至2009年出版,第5、6、7、8、9辑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在2010年至2015年出版,这些论著均推动了黄埔军校研究。

② 陈适等:《孙中山黄埔建军纪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27—28页。

③ 李奇中:《黄埔练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225—226页。

④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第28页。

一期学生除了正取生之外,还有备取生。5月7日,第一期招生中的备取生,共120人进校,编为第4队,与先期入校的第1、2、3队合称为第1总队,总计学生人数470人。第4队学生多来自各方面保送的学生,保送这些学生有两种情况:一是来自与孙中山革命主张有联系的部队,如谭延闿、李济深、邓演达、沈应时、陈铭枢、熊克武等,他们向孙中山保荐自己的部属,这部分有八十多人;二是因军校缺少分队长,每队需正、副分队长18人,4个队共需72人,这部分人员从有关部队中挑选优秀班长充任,实到三十多人。不久,9月黄埔军校教导团宣布成立,部分官兵到位,教导团开始招收学兵,先取73人,其中68人由湘军总司令部选送,多数曾充任军官,后从投考学生中又挑选27人^①。由此可见,黄埔军校与当时广东各派军队之间的复杂关系,既有矛盾的一面,也有相互联系、互动共存的一面。但是,随着黄埔建军迅速发展和广东政权日渐统一,各军独立的军事教育机构逐渐整合进入黄埔军校之中。

一、警卫军讲武堂和陆军讲武学校并入黄埔军校

第一个并入黄埔军校的军事教育机构是广东警卫军讲武堂。1923年孙中山第三次开府广州后,任命吴铁城为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兼广东省警务处长。此前吴铁城所辖领的东路讨贼军第一路司令部队,这时已集中广州组训,奉令改编为广东省警卫军,吴氏兼任司令。改编之初,时值云南讲武堂毕业军官来粤投效,其中多属华侨子弟,因为广东省军队下级军官多为行伍出身,无法安插,孙中山以广东警卫军正在组训中,故把这批军官交由吴铁城设法安置。吴氏奉命后,将警卫军编为三团,并有炮兵一营,骑兵一连。与此同时,吴铁城另办一所警卫军讲武堂,以训练下级干部,任命蒋群为教育长(蒋系江西九江人,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是辛亥革命时期吴铁城在九江起义之同志)^②。1924年5月报纸刊登广东警卫军讲武堂消息:警卫军吴铁城司令“治军有方,兹以下级军官,为练军之基础,故决定成立讲堂,以造办此种人才,因聘定军事家多人,筹办一切,闻已筹备就绪”。讲武堂的招生要求是:一、“主义及保证,服膺国民党主义,有志向学之党员,并须有两个党员之介绍;二、“学力,中学毕业暨有相当之学力者”;三、“体格,五官端正身体健全;年龄,十八岁至二十五岁”。考入讲武堂后一切费用,由该校供给^③。

广东警卫军讲武堂成立伊始即与黄埔军校存在关联,因为在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时期,全国各地到广州应考军校未能入学者,往往被安排进入警卫军讲武堂学习。国民党中央多次指示警卫军讲武堂接收黄埔军校落第学生。1924年5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函黄埔军校落第学生,转入警卫军讲武堂学习,“拟将各生等汇送该讲武堂,略加甄别,从宽取录,以宏造就”^④。5月27日,国民党中执会致函警卫军讲武堂筹备处,第二次函送黄埔军校初试及格学生云飞扬等10名,未及与试学生刘雄等78名,认为均是可造之才,送入警卫军讲武堂学习^⑤。30日,国民党中执会再次致函讲武堂筹备处,第三次函送黄埔军校前次初试及格学生钟振贤等5名,未及与试学生刘霆震等5名,另外有陕西投考学生韩景琦、王景明二人,送入警卫军讲武堂学习^⑥。

1924年6月底,报纸公布了警卫军讲武堂招生名单,正取120名,备取10名^⑦,包括郑介民、王大文等人。实际上,警卫军讲武堂招生不止此数,从内部档案《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学生名册》可知,讲武堂有来自全国13省的297名学生,分别是:广东154名,湖南48名,广西37名,安徽14名,江西13名,浙江8名,

① 陈宇编著:《黄埔军校年谱长编》,第20—21、51页。

② 吴铁城:《吴铁城回忆录》,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第119页。

③ 《警卫军讲武堂》,《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5月24日,第7版。

④ 《中执会致军校落第学生函稿》(1924年5月4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汉16301。

⑤ 《中执会致粤警卫军讲武堂筹备处函稿》(1924年5月27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汉16325。

⑥ 《中执会致粤警卫军讲武堂筹备处函稿》(1924年5月30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汉16326。

⑦ 《警卫军讲武堂招生揭晓》,《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1日,第7版。

江苏6名,福建2名,湖北8名,山东1名,陕西1名,山西3名,河南2名^①。警卫军讲武堂原定1924年7月1日开学,后因校舍修筑未竣,改为16日入学,但很多学生远道而来,久宿旅馆,经济困难,为此,吴铁城等特别悬牌照准:“凡住旅馆之学生,得于即日移入省公署内筹备处暂住。”^②实际上,讲武堂学生后来长期住宿在省长公署招待所里面,约三个月后,至10月广东革命政府镇压商团叛乱后,警卫军讲武堂归并黄埔军校,其学生160人另编一队,后划入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生^③。

警卫军讲武堂学生王大文的晚年忆述,大体证实了上述情况。王大文,是新加坡华侨归国人员,他报考黄埔军校,但未被录取,后来廖仲恺命令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在东沙头设立一所警卫军讲武堂,安排和收容这批未被黄埔军校录取的青年,王大文便进入警卫军讲武堂学习。学员除王大文之外,还有郑介民、吉章简、蔡劲军、钟光悉等人,学员们都住在省长公署招待所内。经过1924年10月镇压商团反叛事件之后,警卫军讲武堂停办。这时适逢黄埔军校第二期招生,廖仲恺以黄埔军校党代表的身份,决定将这批讲武堂学员全部并入黄埔军校第二期。这样,王大文便成为黄埔军校第二期步兵科的一名学员^④。

第二个并入黄埔军校的是“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创设过程颇为特殊,当时广东各派军队,基本都有自己的军事教育机构,而作为最高统帅部的大元帅府大本营,却没有自己的军校。时任大本营军政部长是来自湖南的程潜,他打算组建大本营所属的军校。程潜呈请孙中山批准后,在1923年11月创办陆军教导团一所,“嗣因招收各处中小学毕业生甚多,而各军亦多欲挑送军官加入,经改为陆军讲武学校”^⑤。名义上,该校直属大本营,实际负责筹备工作的是大本营军政部,因此,学校正式名称是“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一般又称之为“军政部讲武堂”。地点在广州北较场广东陆军医院旧址,因为经费所限,除校本部利用陆军医院原有房屋办公外,食堂、课堂、寝室、浴室等是利用棕叶、竹条临时搭建的,颇为简陋。大本营军政部长程潜对该校非常重视,他兼任校长,多方筹划。校长之下设监督一人,由周贯虹担任(周系江西南昌人,出身江西陆军讲武堂,后留学日本,1918年任湘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参议,后任军政部军需局长)。襄助监督,实际担任教育责任的是教育长李明灏(程潜同乡,湖南醴陵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讲武学校校本部设秘书室及教务组、总务组、军需组、医务组等,分别掌管有关业务。

1923年冬,陆军讲武学校酝酿开办时,程潜等派人到湖南密查招生,在长沙就录取了青年学生一百多人。因为人数不够,他们在广州以军士连为基础扩大招生^⑥。在广州直接招收的学生,大部分是投奔广东寻找革命机会的知识青年,也有一部分是湘军、滇军的下级军官和军士,年龄一般在18岁至25岁之间。学生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以中学生居多。从学生的籍贯来看,虽然学校办在广东,而湖南人占绝大多数,广东、广西籍次之。陆军讲武学校第一期新生四百多人,入校后编为四个队:第一、二两队学科与术科并重,以大教程(战术、筑城、兵器、地形、交通)为主,规定学习时间为一年;第三、四两队注重术科,以小教程(典范令)为主,学习时间为六个月。队职干部和军事教官大多是日本士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军事学识都有一定基础^⑦。

开学半年后,1924年8月陆军讲武学校第三、四两队学生毕业,多数学员被分配到广东北部韶关马坝附近的程潜所部“攻鄂军”中担任排、连长,仍有少数毕业学员无法安插。这时,讲武学校中第一、二两

① 《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学生名册》(1924年5月),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汉13062。

② 《警卫军讲武堂开学改期》,《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10日,第7版。

③ 《中央秘书处致蒋中正等函稿》(1924年10月14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汉10526;陈宇编著:《黄埔军校年谱长编》,第57页。

④ 王大文:《考入黄埔第二期的前前后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287—288页。

⑤ 《程潜上总理呈》(1924年11月),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汉2787。

⑥ 在陆军讲武学校设立之前,军政部成立教导团军士连,共两个连,军士连的学兵也多从湖南招收而来。

⑦ 汤季楠:《记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第6辑,1963年,第109—111页。

队学员对三、四队毕业生的就业安排颇感失望。此前讲武学校很多学员就很羡慕黄埔军校,这时更希望能转入黄埔军校,一时议论纷纷。这时校长程潜带兵在粤北韶关,无法顾及学校事务,加上讲武学校经费窘迫,难以维持,程潜呈请孙中山,说明该校经费窘困:“查自开办迄今,已阅八月,所需经常临时各费,虽曾奉钧令指定财厅月拨若干及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酌助若干,然每因经济方面之事实变迁,不能如数以与,而校中伙食薪俸及必需之教育用品等费,则刻不容缓,四处挪扯,积累至今,亏负已达一万数千元之巨。”如今程潜“奉命远征,更难兼顾,不得已只有恳请钧座另简贤能接任校长,以资维持”^①。在此情况下,讲武学校第一、二队学生开始“并校”活动。二队学员张伯黄(湖南明德中学毕业,共产党员)在校内进行串联,后学员们推选张伯黄、陈明仁、胡焕文、杨润身、刘梓馨等12人为学生代表,出外分途活动。学员代表分别联络廖仲恺、蒋介石等广东革命政府军政要员和苏联顾问^②,希望该校能并入黄埔军校。

1924年11月孙中山指示:陆军讲武学校改革事宜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酌情办理,随即国民党中执会议决:委任蒋介石为陆军讲武学校校长,廖仲恺为该校党代表^③。当然,作为讲武学校的主要管理者,周贯虹、李明灏等很不愿意该校合并入黄埔军校,因此,欲并校的学生与校方管理人员产生矛盾和冲突,学生呈请国民党中执会,指斥讲武学校官长,“除前校长程(潜)总司令外,其余皆为反革命派,对生等之入党及设立区党部皆极端压迫阻止”,形成一股不小风潮,国民党中执会指令蒋介石负责办理此事^④。根据蒋介石方面的史料记载:1924年11月19日,陆军讲武学校并合黄埔军校,陆军讲武学校学生(158名)编为第六队。因为讲武学校办事人员对于学生入党及设立区党部竭力摧阻,以致发生风潮,故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并合之^⑤。很快,黄埔军校派教官王俊到讲武学校将第一、二队学生接去黄埔,编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六队。经过两个月训练,在他们参加第一次东征的淡水前方宣布毕业,毕业学员分别安排到黄埔军校所属的教导一团(团长何应钦)、教导二团(团长王柏龄)和黄埔三期入伍生总队所属的各连队充当见习官或副排长、排长^⑥。

值得说明的是,陆军讲武学校并入黄埔军校,并非完全并入,讲武学校官长基本没去黄埔军校。这时,程潜所部的建国攻鄂军驻扎粤北韶关马坝,他在距离马坝十五里的南华寺设立“攻鄂军讲武学校”,继续招生入学。1925年底1926年初,国民党中央决定:“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改组为“国民革命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各军所属军校一律撤销,并入黄埔军校统筹办理(详后)。这时,程潜所属军校第二期学员已经毕业,在校的第三期学员的大部分并入黄埔军校第五期^⑦。

二、平定刘杨叛乱后接收滇军干部学校、桂军军官学校

1923年孙中山能重返广东再建政权,主要借助了杨希闵滇军、刘震寰桂军力量,其后滇军、桂军成为广东两支势力最大的客军。他们自恃功高,专横跋扈,不听号令。为了扩展自己势力,滇军、桂军也建立各自的军校。

在筹建黄埔军校的同时,1924年4月滇军总司令杨希闵“为谋所部将士增进军事学识起见,拟于日

① 《程潜上总理呈》(1924年11月),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汉2787。

② [前苏联]卡尔图诺娃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加伦在中国(1924—192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67—70页。

③ 《中执会上总理呈》(1924年11月7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汉4003。

④ 《陆军讲武学校全体学生上中执会呈》(1924年11月16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汉11267.1。

⑤ 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1册,台北:“国史馆”等,2014年,第287页。

⑥ 刘梓馨:《广东讲武学校学生一、二队合并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六队的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北文史资料》第9辑,1984年,第11—13页。

⑦ 汤季楠:《记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第6辑,1963年,第119页。

内将滇军干部大学,改为滇军干部学校,教授军人道法、军事学识、战斗学等科学,飭令所部下级干部人材,入校学习,该校地址,仍在燕塘旧四标营”^①。据报道,滇军干部学校“兼收各军所遗军官,粤人亦不少,但该校教育皆以普通话讲述,粤生多听不懂,该校今为学生学业增进起见,特增设国语一科,于课余教授粤生云”^②。为了加强对各军的领导,1924年11月国民党中央派甘乃光、李子峰两人前往滇军干部学校,组织特别区党部,这时该校员生共五百六十余人,已入党者四百余人,其余已填入党表而因事未领取党证者实居多数^③。根据大本营1925年4月的调查,滇军干部学校学生队大约是六百人^④,规模不小。

根据曾任滇军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的包惠僧忆述:1925年前后,滇军在北较场办了一个滇军干部学校,有一千几百名学生,学校的规模与黄埔军校大同小异,只是精神上有所不同,也是廖仲恺任校党代表,包惠僧任政治部主任(政治部没有成立),苏俄顾问团也派了一个军事顾问,学校当局对包惠僧等人非常冷淡。校长是杨希闵的参谋长周自得兼任,由于周氏兼职很多,来校办公时间很短,经常一连几个星期不到学校,严重影响校务开展。学校的设备,东倒西歪,教官休息室、会客室,桌椅不全,连茶壶茶杯都没有。包惠僧每次去上课,有一个姓周的教育长接待,每有攀谈,他总是要请廖仲恺拨款成立政治部,要苏俄顾问拿军械给他们成立教导团。他们认为国民党与苏俄代表团对黄埔军校与滇军干部学校是不公平的对待^⑤。

刘震寰桂军创办了“建国桂军军官学校”,刚成立时校址在广东虎门。该校的干部、学员从桂军部队里调来,都是广西人,有学校出身的,有行伍出身的,不招收文学生。校长名义上是刘震寰,实际是由一位日本士官出身的少将监督吴安伯(江西人)负责。桂军军官学校的组织比较简单,只有一个大队,三个中队,学员三百多人。上校大队长是张治中,其实际负责一切训练教育,第一中队长是伍树帆,第二中队长陈奇涵,第三中队长是张鼎家。军校只有军事教官没有政治教官。军事教育要求很严,特别是术科。该校经费缺乏,教官“生活很清苦,根本就无所谓饷”。1924年夏天,桂军军官学校从虎门迁到广州东山皮革公司旧址。到广州后,孙中山派廖仲恺兼任该校党代表,派甘乃光为政治部主任,仿效黄埔军校,由甘乃光讲三民主义政治课,也请一些名流学者来校作专题报告,邹鲁、戴季陶等先后来校作过报告。此后,该校政治空气逐渐浓厚起来。接着,国民党中央又派来三名苏联军事顾问,并增加一个学生中队,专门招收普通中学生^⑥。

滇军干部学校、桂军军官学校虽然自成系统,但毕竟在广东革命政府辖区之内,革命浪潮不可避免地波及这两所军校。这时期,黄埔军校学生代表、共产党员王一飞、常川在广州组织群众运动,与驻广东的粤、湘、滇、桂军讲武堂的进步学生取得联系,扩大革命影响。他们先在黄埔军校成立青年军人社,抱着团结各军青年军人,坚决不做军阀、政客工具,为反帝反封建革命奋斗到底的宗旨,并编印《青年军人》期刊广为发行宣传。1925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青年军人社扩大组成“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参加者既有黄埔军校已毕业和未毕业的学生,也有驻粤各军的进步军官。该组织可谓广东各军进步青年军人的大联合,在各军中扩大革命影响起了很大作用^⑦。

1925年6月,东征军(党军)回师广州,平定了刘杨滇桂军叛乱,滇桂军这两所军校也被接管,学生并入黄埔军校。需要说明的是,当时“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在这两所军校有较大影响,这在接管两所军校

① 《滇军干部学校》,《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4月29日,第9版。

② 《滇军干部学校》,《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6月6日,第7版。

③ 《滇军干部学校组织区党部》,《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1月12日,第7版。

④ 《广东军队一览》,(北京)《晨报》1925年5月11日,第3版。

⑤ 包惠僧:《大革命时代在黄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130—131页。

⑥ 覃异之:《回忆黄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272—273页;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上册,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55页。

⑦ 陈适等:《孙中山黄埔建军纪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35页。

中作用很大。据包惠僧回忆,在平定刘杨叛乱之前,滇、桂军两所军校“差不多是完全投到青年军人联合会领导之下,以及各工会、学生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都在有形与无形之间配合党军,作各种打击敌人的活动,对于扩大战线、缩短战争的时间,起了很大的作用”。6月,东征军(党军)回师广州,迅速平定刘杨滇桂军叛乱,滇桂军除了少数人员逃跑之外,“差不多是百分之九十九的缴械投降”,当时收容俘虏,安抚流亡,是一项很繁重的紧急工作。此时滇桂军两所军校的很多学生做了不少重要工作,他们“会合协助党军收容俘虏,被俘的滇桂军共约二万余人,分别收容在广州市东郊的燕塘,西郊的西村及黄埔”^①。显而易见,平定滇桂军叛乱后,刘杨所部很多人员被吸收充实到革命军队中,其中包括两所军校的学生。

广东革命政府在平定刘杨叛乱和接收两所军校的总体政策一样,但根据客观情况,在执行时也有所区别。平定杨希闵滇军叛乱后,同为滇军出身的朱培德,收容散落在广东各地的滇军军官,组成后来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并开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学校,校址在广州大沙头,熊式辉任教育长^②。1926年2月,该校并入由黄埔军校改组而来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③。对于刘震寰桂军军官学校的学生,平定叛乱后,国民党中央大体处置安排如下:第一期学生按黄埔军校第二期待遇,第二期学生入学不久,尚未毕业,编入黄埔军校第三期继续受训^④。后来担任桂军军官学校学生队长的季方晚年忆述:1925年6月东征军回师广州,迅速平定了杨刘叛乱,“叛军有一个军官学校(指桂军军校),它的学生被编入黄埔军校——那时第一期学生已经毕业,但他们还是作为第一期第十队,要我去担任队长,大概半年光景就也毕业了”^⑤。

1926年1月,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举行毕业典礼。这期学生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黄埔本校招生一千多人,自1924年冬末开始入伍,编为入伍生第1、2、3营,平定刘杨叛乱后,本期入伍生经过考试转为正式学生,改编为3个大队,内分9个步兵队,1个骑兵团。第二,第一次东征时,蒋介石在潮、梅收编部分陈炯明粤军下级干部,设立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本分校学员列入第三期毕业生名册。第三,平定滇桂军叛乱时,俘获部分下级干部,在广州设立训练班,毕业时列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名册^⑥。

三、“打破地方主义”:改组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广东革命政府日渐巩固的过程,即内部逐渐统一的过程。1925年上半年,经过第一次东征和平定刘杨叛乱之后,广东革命政府明显加快了内部统一步伐。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随后成立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由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兼任,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智、蒋介石等为委员。军事委员会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及监督、管理,统率国民政府所辖境内陆海军、航空队及一切关于军事各机关,下设训练部、参谋团、海军局、航空局、秘书厅、兵工厂等机关。军事委员会是第一个统一协调拥护国民党的各类军事力量的机构。7月底,军事委员会决定统一军队,取消以省为名的军队名称,统一称为国民革命军。8月,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湘军总司令谭延闿、滇军总司令朱培德、攻鄂军总司令程潜等相继通电交出军权,军事委员会议决:以黄埔军校校军为主体组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

① 包惠僧:《大革命时代在黄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136—137页。

② 熊式辉著,洪朝辉编校:《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1907—1949)》,香港:明镜出版社,2008年,第81页。

③ 史全生主编:《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47页。

④ 覃异之:《回忆黄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274页。

⑤ 季方:《黄埔散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211页。

⑥ 陈宇编著:《黄埔军校年谱长编》,第216页。

介石任军长;“建国湘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谭延闿任军长;“建国滇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朱培德任军长;“建国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9月,改编李福林所部为国民革命军第五军,李福林任军长;11月,程潜所部“攻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程潜任军长。

这时期各军的军校当中,规模较大有建国粤军讲武堂、建国湘军讲武堂、建国攻鄂军讲武学校等。在1924年黄埔军校建立前后,建国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在广州开办“建国粤军讲武堂”,以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生梁广谦为堂长,“抽调各部队的中下级军官佐轮流入堂学习,以提高其政治觉悟和军事学术,并望以此充实干部力量。有些师团还以开办军士教导营(队)的各种形式,进行培养、教育初级干部,期成劲旅”^①。据报道,9月许崇智“为造就陆军人才起见,特设立讲武堂,令所辖各军师旅警备司令,分送军官入堂学习”,合计262人^②。建国湘军讲武堂,即谭延闿所部湘军的军校。谭延闿自任湘军讲武堂督办,湘军将领陈嘉祐任讲武堂堂长。1925年3月湘军讲武堂开办,“甚欲施以党之组织及训练,俾养成党军干部人材,为异日效命之用”,请廖仲恺为党代表主持党务事宜,并嘱政治部长谢晋随时秉承意旨共策进行^③。后来,建国湘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湘军讲武堂改称第二军军官学校。广东革命政府苏联顾问鲍罗廷支持以第二军军官学校学员为基干组成教导团,陈嘉祐兼任团长,后改教导师^④。根据大本营1925年4月的调查:粤军军官学校学生队六百人,湘军讲武堂学生队五百人^⑤。建国攻鄂军讲武学校,即湘军另一将领程潜所部的军校,当时规模也较大,截至1925年底,该军校约有学生四百人^⑥。

军事统一,包括军事教育的统一,必须把原属各军各自办理的军校整合起来。经过1925年10、11月第二次东征后,蒋介石事实上已经掌握广东革命政府的军事大权。12月15日,蒋介石上呈军事委员会《改革军政建议书》,共六项,其中第四项即“军事教育应谋统一”,蒋写道:“近年以来,各军多设立军事补习性质之学校,此本注重军事教育之好现象,然办法纷歧,名称不一,即此骈枝叠出。已贻事倍功半之讥,倘或派系互分,更有利少害多之惧。欲谋军政之统一,必先谋军事教育之统一,其机关名称,应明白规定,以后一切军事教育机关,皆须统一,各部队不得自行设立。”^⑦蒋氏意思很明确,在北伐以前,统一军事教育,如此方能促进军政统一。在粤的湘军将领方鼎英,1925年协助办理湘军讲武堂,后来调任黄埔军校教育长,方鼎英参与各所军校的整合过程,他晚年忆述:“当时各军的教育,各自为政,问题很多,因此蒋介石以统一军事教育为名,召集各军的负责人开了一个教育会议,我亦参加该会。大家感到要统一军权,首先要统一军事教育。会议讨论了统一教育方案,并决定今后各军的军事教育应归黄埔军校统筹办理。各军原有的军事教育机构,一律裁撤。此案讨论通过后,会议即告完毕。”^⑧

实际上,军事教育统一也是国民党中央大多数人的共识。汪精卫后来解释说:“本来军事委员会对于统一军事学校这个问题,已经讨论很久,去年(即1925年)十二月就决定了”,“我们要知道,集中各省人才来训练,比较分开去训练,收效一定要大得多的。”汪精卫特别解释说:

各军长大家注意改良军队,创办军官学校,并不是理想上如此,是事实上如此的。如果我们拿全盘来计划,本来只有一个军官学校便够了,并用不着一军成立一个军官学校;因为各军都是受国民党的指导监督的。如果一军有一个军校,就含有地方主义的色彩了。从前政府决议把湘滇粤等

① 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粤军史实纪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9页。

② 《粤军讲武堂学员之支配》,《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9月5日,第6版。

③ 《湘军讲武堂致廖仲恺公函》(1925年3月26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汉2789。

④ 陶峙岳:《陶峙岳自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页。

⑤ 《广东军队一览》,(北京)《晨报》1925年5月11日,第3版。

⑥ 《建国攻鄂军讲武学校特别党部呈中执会函》(1925年12月29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汉2831。

⑦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1887—1926)》,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422页。

⑧ 方鼎英:《我在军校的经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71页。

军的名目,编为第二、三、四军,就是要打破地方主义!我们不仅是在名义上要如此,在实际上也应该要如此。不然,还是换汤不换药。所以政府为打破地方主义,为集中人才起见,不能不统一军事学校。因此当时本校的名称拟叫做“统一军事政治学校”。后来因为国民党向来用“中央”二字的名义,才改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①

1926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过决定:“国民革命军军事、政治教育,有统一之必要,宜合并军校暨各军所立学校,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分军官班、军官预备班、入伍生班,仍以埔校为校舍”,通过“改组陆军军官学校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提案”。随即公布《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组织大纲》,规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直隶于军事委员会,校长以建有功勋的将领充任,其军阶与军长同等。校内设一委员会,校长为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参谋团主任、政治训练部主任及校内最高顾问等为委员,依军事政治的目的,审定教育的纲领、草案和预备教育工作等。校内分设二部:一为预备军官班,毕业后试充军职;一为军官班,毕业后任正式军职。以上两班均按各种军事的特别学程,分为步兵、炮兵、工兵、政治和军需等科。军官班内备有初学的学程,以便缺乏军事学识的青年军官补习后,再升入军官班。军事委员会通过这个组织大纲后,各军军官学校均不准再招新生,废止现在的各军军官学校。这个组织大纲发生效力后,其他军校所招收到的新生,统一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处理^②。改组后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习惯上仍简称黄埔军校。

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邓演达、严重、邵力子、熊雄、陈公博、冯宝森等为中央军校改组筹备委员,从2月1日起开始改组工作。3月1日,中央军校举行成立典礼,8日举行开学式,学生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及第五期入伍生,还有来自各军军官学校学生,总计2650余人,盛况空前。据统计,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是2654人,这期人数超过此前第一期(645人)、第二期(449人)、第三期(1233人)的总和^③。毋庸置疑,在整合各所军校基础上改组建立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大大推动了广东革命政府的军事教育和军事力量的发展。改组后军校归属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校址仍设在黄埔岛,军校组织设置有不少改革和调整:军校分入伍生班、军官预备班、军官班;除政治、教授、训练三个部仍旧外,军医部改为军医处,军需部改为管理处,另设副校长、入伍生部、经理部、军械处、编辑处、高级班、兵器研究处等五部五处一班;在各部、处之下分别设有俱乐部、印刷所、医院、疗养所、军械库、监狱等40多个附属机构,配合校务工作的全面发展;学员分为学生队、高级班、入伍生、学生军和军事教导队五大类。改组后的军校校长仍是蒋介石,李济深任副校长,邓演达任教育长,邵力子任政治部主任^④。

四、军事教育整合之助推因素

从1917年起,孙中山三次在广州开府设政,试图推翻北洋军阀政府,建立真正的“中华民国”,但都没有成功,原因在于孙中山自己没有掌握军队,他所依靠的粤军和诸多客军,矛盾分歧,难以形成统一的军事力量。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孙中山晚年在广东筹建黄埔军校,组建一支自己掌握的有主义的军队,初见成效,然而,孙中山生前未能亲见“党军”威力,也未能真正统一作为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实际上,在孙中山生前,他也意识到这种各自为政的军事教育所存在的问题,试图将其“统一训练”。1924年8月6日,孙中山出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议设立统一训练处,“将陆军军官学校、滇军干部学校、陆军部讲武堂、西江陆海军讲武堂、警卫军讲武堂、警卫军学兵营及航空局归其训练管理”,训练处由孙中山任主席,杨希闵、许崇智、蒋介石、宋子文、程潜、鲍罗廷为委员。然而,估计考虑到现实情况,数天

① 汪精卫:《建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缘由》,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第74—78页。

②④ 陈宇编著:《黄埔军校年谱长编》,第212、213、225、227页。

③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第93页。

之后,13日孙中山又谕令中央政治委员会即刻撤销统一训练处^①。此后,孙中山依然思虑此事,11月他任命廖仲恺为“所有党军及各军官学校讲武堂”的党代表^②,显然有联络、协调乃至逐渐整合各所军校之意。身为各所军校党代表的廖仲恺,确实为协调、团结各军校做了很多工作。例如,作为滇军干部学校的党代表,廖仲恺与苏俄军事总顾问加伦讨论过该校问题,廖仲恺主张支持该校,并为此付出很多努力,认为“这样做可以培养自己的人,以便通过他们去影响滇军”;加伦说,鲍罗廷曾资助过该校,只不过不是经常资助,鉴于该校经费极度缺乏,眼前可提供粤币两千元,也仅此而已;廖仲恺还强调“该校对控制滇军关系极大”^③。显而易见,廖仲恺着眼广东军政大局来筹划军校工作。

军事教育整合是广东革命政府内部统一的组成部分。广东革命政府频繁的内部军事行动和军政形势变动明显助推了军事教育整合进程,例如,在1924年10月镇压广州商团叛乱中,客观上要求各种(准)军事力量相互配合,统一行动,这要求军权统一。当时,孙中山向广东各支军队及准军事力量下达平叛命令:“兹为应付广州临时事变,在未平靖期内,所有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飞机队、甲车队、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陆军讲武堂、滇军干部学校、兵工厂卫队、警卫军,统归蒋介石指挥,以廖仲恺为监察,谭平山副之。”^④令粤、滇、湘、桂各军,分任各街防守,协调一致应对商团叛乱事件。广东军政形势变动也朝着统一方向推进。在1925年6月平定刘杨滇桂军叛乱后,广东境内最大的半独立军事集团是许崇智所部的本土粤军。8月廖仲恺被刺案发生后,调查牵连许崇智,许氏被迫离粤赴沪,所部粤军被蒋介石缴械、整编。广州国民政府发布命令:一、粤军总司令许崇智,请假赴沪养病,所有该部收束事宜,由该军参谋长蒋介石办理;二、许崇智担任的国民政府军事部长一职,由谭延闿署理;三、关于东莞、增城、宝安一带之军队,统归蒋介石分别处理。至此,势力最大的粤军完全被纳入国民革命军之中,广东内部军政更趋统一。军政统一大大助推了军事教育的整合进程。

作为广东革命政府最大的外援力量,苏俄和共产国际乐见广东军政统一和军事教育整合,显然,这有利于进一步扩展苏俄在广东的实际控制力和影响力。苏俄顾问对广东各军情况非常了解,对各军所属的军校也很重视。根据苏俄军事总顾问加伦1925年1月报告,他们非常重视各军工作,特别是军队的训练工作和政治工作,对滇军,要求“加强军校的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以便将学员培养成未来从基层下手分化滇军的带头人”;对桂军,“在军校内深入进行正面的政治工作”,“通过座谈和报告会启发学员,让他们主动要求改编部队,使之正规化”^⑤。正因此,在1925年6月平定杨刘滇桂军叛乱中,滇桂军所属两所军校的很多学员站在广东革命政府一边。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广东革命政府的军事教育整合进程,除了军政时局变化和高层推动之外,还有来自底层的革命力量。原本在程潜所办的陆军讲武学校学习、后来转入黄埔军校的陈赓,20年后忆述此事时说:“我以为革命青年不应分散力量,甚或为私欲者所利用,而应集中黄埔训练,积极主张武校合并军校,我并以身作倡,首先退出该校,考入黄埔。是后武校同学相率来归,以致全校合并黄埔,改编军校第一期。”^⑥陈赓这种“积极主张武校合并军校”,虽属事后忆述,但应该是当时很多奔赴广东的革命青年的共同想法。除个人行动之外,也有组织作用。其中,中共组织作用特别重要。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由共产党员掌握,军校的政治部主任由共产党主要负责人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不仅在本校学员中,而且在其他陆军学堂中广泛开展政治工作,启发学员关心社会政治事件。其他陆军学堂虽然实行的是旧军阀制度,但受黄埔军校的影响,也都逐渐关心起政治来了。学堂学员纷纷要求在本学堂成立国民党党部,要求

① 桑兵主编:《孙中山史事编年》第10卷,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5581—5582页。

②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04页。

③⑤ [前苏联]卡尔图诺娃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加伦在中国(1924—1927)》,第73—74、75、106、107页。

④ 桑兵主编:《孙中山史事编年》第11卷,第5831页。

⑥ 陈赓:《我的自传》(1944年5月29日),《陈赓日记》,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第360页。

把政治课列入教学大纲。就连老牌军阀一手建立起来的陆军学堂也开始大造反对军阀制度的舆论。”^①

在联络、团结各所军校,推进军事教育整合过程中,“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作用甚大。随着革命形势一日千里,广东各处青年军人深感联合行动之必要,在共产党员蒋先云等人筹划下,“各军事学校以及海军,感觉军人有团结以挽救时局之必要,因此有中国青年军人代表会的组织”,加入该项行动的军事组织有:陆军军官学校、粤军讲武学校、桂军军官学校、滇军干部学校、铁甲车队、福安兵舰、舞风兵舰、飞鹰兵舰、军用飞机学校等。经过筹划后,1925年2月1日,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在广东大学操场举行成立大会,蒋先云主持大会,到会人员有黄埔军校600余人、滇干校700余人、粤武校270余人、桂军校290余人、甲车队100余人、海军30余人,共约2000人^②。6月,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发表时局宣言,指出:“列强勾结军阀,压迫我们民众,是无微不入,不分省界。革命军人,也是各省受压迫的民众集合而来的。我们革命的事业,是解放全中国民族,不是革了那一省的命就算完了事,所以我们军人,是没有省县地方的界线、只有革命与非革命的分别。少数反革命野心家想借‘省军’的名称,划出多少疆界,造出谁是主军,谁是客军;主军不利于客军,或客军不利于主军的种种谣言,叫我们兄弟自相残杀,他却发财升官逍遥快活。这种少数野心家,就是列强与军阀的工具,是我们革命军人的仇敌。所以现在的战争,是革命军与反革命军的战争,并不是什么粤军、滇军、桂军、湘军、豫军的战争,因为那一个军队,也有各省的弟兄。”在军人联合会提出的八项要求中,第一条即“统一军政,废除‘省军’的名称”^③。可见,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所主张的打破地方主义,打破此疆彼域,各支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对推进军权统一、军事教育整合的作用甚大,这可视为一种来自底层的革命力量。

无可否认,军事教育整合也会影响一些人的权力和利益,自然也有抵制。在1924年11月,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并入黄埔军校,大多数学员非常愿意“并校”,但讲武学校的管理者和教职人员并不愿意。讲武学校监督周贯虹“内心并不同意,但为形势所逼,又无可奈何”,当黄埔军校派人接收学生,学员们携带行李,整队集合,周贯虹“眼见学校就要散伙,不禁痛哭流泪”;并入黄埔军校后,原来讲武学校的“队上官长都没有来”^④。显然,他们并不愿意并入黄埔军校。当然,作为陆军讲武学校的创办者程潜,内心也不愿意该校并入黄埔军校,但在当时内外情况之下,也只能“忍痛割爱”。不过,在国民革命洪流中,这些不愿意与抵制非常微弱,完全不能改变军事教育整合的进程。

结 语

在1924年组建黄埔军校前后,在广东的各支军队为了扩展自身力量,往往自设军校,培养自己的军事人才,相继建立了随营军官学校或讲武学校。各军自成系统,各校各自为政。孙中山生前也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囿于内外形势和自身实力而未能解决。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在苏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国民党中央厉行军政统一的各项举措,成效显著,广东(甚至两广)实现了统一。

随着广东革命政权逐渐统一,必须改变这种军事教育不统一的局面。在军事教育整合过程中,作为广东革命政府军事教育龙头的黄埔军校,逐渐合并其他军事教育机构和准军事教育机构。1924年10、11月,作为准军事教育机构的吴铁城所属广东警卫军讲武堂、程潜所部的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合并进入黄埔军校。1925年6月,广东革命政府在平定杨希闵滇军、刘震寰桂军叛乱中,把滇桂军所属的滇军干部学校、桂军军官学校也整合进入黄埔军校。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随后组建军事委员会,所辖各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17—1925)》第2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第705页。

②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第329、330、332页。

③ 《青年军人对时局第二次宣言》,《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6月3日,第6版。

④ 汤季楠:《记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第6辑,第116页。

支军队统称国民革命军,明显加速军政统一步伐。军权要统一,军事教育整合自然提上议事日程。12月,国民党中央讨论统一军事教育方案,决定“打破地方主义”,各军的军事教育归并黄埔军校统筹办理,各军原有的军校一律裁撤。在整合各所军校的基础上,黄埔军校正式名称由“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改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蒋介石仍任校长,新组建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内部组织设置也进行了相应调整。不少黄埔建军的亲历者晚年忆述:黄埔军校的学生来源,除了国共两党通过各种渠道从全国各省招生外,还包括“驻广东各军附设的军事教育机构,包括军政部讲武堂、警卫军讲武堂、桂军军官学校和粤军、第五军军事学校等,后来都纷纷停办,学生拨归黄埔军校”^①。因此,从军事教育整合的角度来考察黄埔军校的迅速发展,是理解1920年代广东黄埔建军的重要线索之一。

Integration of Military Education in the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of Guangdong: Insights into th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Army Being Built from the Whampoa Military Academy

Li Zaiquan

Abstract: At the time of the prepar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hampoa Military Academy 黄埔军校 in 1924, the various factions of the army under the Guangdong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had also established their own military academies, with each army and military academy operating independently and managing their own affairs. As Guangdong's military and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gradually unified, the process of military education integration began, with the Whampoa Military Academy, the leader in military education, gradually absorbing other military academies. In October and November of 1924, the Guangdong Guard Army under Wu Tiecheng 吴铁城 and the Army Academy under Cheng Qian 程潜 we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Whampoa Military Academy. In June 1925, during the suppression of the Yang Liu Dian Gui Army 杨刘滇桂军 rebellion, the Yunnan Army Cadre School belonging to the Yunnan Army and the Guangxi Army Officers Academy belonging to the Guangxi Army were also integrated into the Whampoa Military Academy. By the end of 1925,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Kuomintang resolved to unify the military education program, breaking down regionalism by abolishing all existing military academies of the various factions and merging them into the Whampoa Military Academy, renaming it from the “Chinese Kuomintang Army Officer Academy” to the “Central Military-Political School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Army”. The integration of military education w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unification of Guangdong's military and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Frequent military operations, changes in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the revolutionary forces at both the top and bottom of the hierarchy, were all contributing forces to the integration of military educatio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Whampoa Military Academy, thanks to the integration of military education by the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in Guangdong, provides a key insight into understanding how th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Army was built on the basis of the Whampoa Military Academy.

Keywords: the Whampoa Military Academy; Guangdong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military education;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Guangdong army; army from other provinces stationed in Guangdong

【责任编辑:赵洪艳;责任校对:赵洪艳,周吉梅】

^① 陈适等:《孙中山黄埔建军纪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29页。